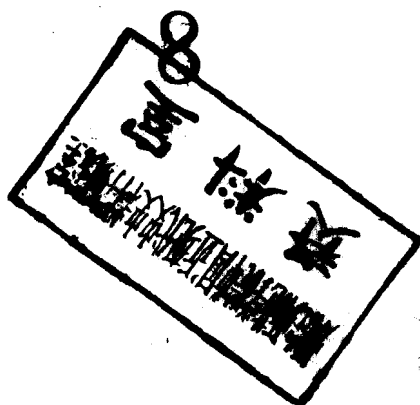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一五五号

长春文史资料



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一月

YT 47/17

長春文史資料 8 目 录

四进长春.....尚传道 (1)

一、序 篇..... (1)

别了贵阳..... (1)

我是怎样到东北的..... (5)

与雷震的交往..... (15)

蒋介石对东北的如意算盘..... (17)

二、一进长春..... (22)

飞机上的熊式辉..... (23)

北平一宿..... (25)

初见长春..... (26)

“人生有限，国运久长”..... (28)

三、二进长春..... (31)

郑道儒称病住院..... (31)

计议对付张嘉璈..... (33)

接收九台、农安..... (35)

政工队深入解放区..... (38)

中央社造谣之一斑..... (40)

鲍莱调查团..... (41)

锦州招待所一夕谈..... (42)

名落孙山，句句狗屁..... (44)

四、三进长春..... (44)

参加东北执行停战小组..... (44)

蒋介石指示：“决不能就地停战”..... (48)

三方代表第一次会议·····	(50)
与李立三两度交换意见·····	(52)
媚美的咀脸·····	(55)
与熊式辉的谈话·····	(55)
第一次兼代长春市长·····	(57)
黄埔系军人的骄横·····	(59)
停战半月·····	(60)
就任吉林省民政厅长·····	(61)
保障吉林大地主权益·····	(63)
如此选举国大代、立监委·····	(64)
“吉林省土地改革方案”·····	(65)
阴沉的北平三个月·····	(66)
锦州三日·····	(68)
再回吉林·····	(69)
五、四进长春 ·····	(70)
“陆地敦克尔克撤兵”·····	(70)
郑洞国坐镇长春·····	(72)
围城前的挣扎与活动·····	(73)
购屯军粮清查余粮·····	(73)
拟定战时长春经济管制方针·····	(74)
督导春耕·····	(76)
组织志愿兵团·····	(76)
组织“防奸，防谍小组”·····	(77)

组织各县游击骚扰解放区.....	(77)
围城以后的顽固坚持.....	(78)
巩固内部.....	(78)
杀民养军.....	(78)
逮捕与屠杀.....	(83)
勾结日特.....	(86)
白骨累累上的灯红酒绿.....	(87)
不同的归宿.....	(88)
六十军起义片断.....	(88)
新七军接洽投诚.....	(91)
李富春突围.....	(93)
放下武器前的郑洞国.....	(94)
我的转折.....	(98)

✓ 法国传教士在小八家子村.....刘明廉 (100)

一、小八家子的由来.....	(100)
二、四次建堂的始源.....	(101)
三、圣母圣心国籍贞女会母院的始末.....	(104)
四、一百年出二十七位神甫.....	(105)
五、“丁圣家”的来历.....	(108)
六、满洲教区要人云集小八家子.....	(110)
七、包主教尸体抬行八百里葬于八家子堂.....	(111)

八、法国教士横行不法	(111)
挖壕筑垒制造武器建立军事据点	(111)
勾引俄军串通土匪扩充自己势力	(112)
私立公堂刁难官府欺压中国百姓	(113)
众教友奋起反抗打击教士反动气焰	(115)
九、义和团反帝斗争风起云涌洋大人逃之夭夭	(116)
十、巴结日寇，助纣为虐	(119)
扩充武装配合日伪“治安肃正”	(119)
协和会小八家子分会成立	(119)
广交日伪要人热衷于反动政治活动	(120)
喧嚣一时的小八家子模范村	(120)
十一、结束语	(122)

共赴国难.....陆光球 (124)

——广西空军抗日空战追记

序	程思远 (124)
前言	(125)
一、为抗日而接受改编	(126)
二、南宁上空迎战寇机	(127)
三、襄阳云下追敌寇	(128)
四、徐州前线助战	(131)
五、汉口指挥部麻木不仁	(136)
六、归德大空战	(137)

七、支援台儿庄·····	(146)
八、衡阳空战·····	(149)
九、南昌空战·····	(151)
十、南雄空战·····	(160)
十一、衡阳车祸·····	(162)
十二、梁山空战·····	(164)
十三、支援昆仑关·····	(168)
十四、地勤人员流血又流汗·····	(169)
十五、与苏联志愿队战地相处·····	(171)
十六、广西空军之命运·····	(175)
十七、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空军人员伤亡一览表·····	(182)
关于婉容的原籍和族属问题 (补正) ·····	(184)

四 进 长 春

尚 传 道

一、序 篇

别 了 贵 阳

一九四五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我的生命史上大转折的一年。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工作。一九三七年底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到任时宣布，他只带一位秘书长、一位秘书、一位省政府委员同来，其他人事一概不动；一九四四年吴被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离开贵阳时，又宣布，随他离去的就是他接任时同来的秘书长、秘书、委员三人。他说：

“你们是国家的公务员，不要随长官的变动而变动，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九四四年底我和省政府的厅处长们在贵阳郊外三桥送别了吴鼎昌；一九四五年初，又在三桥迎接了新任主席杨森。

在旧中国，吴鼎昌是著名的大资本家，是“北四行联合会”的主席，天津《大公报》的老板。他在贵州七年，有一套大资产阶级的作法，有一套自己的主张。譬如说：他主张地方政治要按部就班走，不许躺着不动，也不许跑；他七年如一日准时上班下班。总

之，他是有板有眼的。杨森就不同了，杨森是著名的四川军阀，因为他主张“奉正朔”，拥护蒋介石，蒋介石就重用他。一九四四年冬，以杨森基本部队二十军为核心组成的二十七集团军，从湖南、广西退到贵州独山、都匀一带。日本侵略军一度打到独山，吴鼎昌慌了手脚，在敌人还离贵阳几万里时，就仓忙地决定把省政府搬到毕节去，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地方人士纷纷责难。蒋介石决定调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替吴鼎昌的主席职位。另调嫡系亲信汤恩伯的部队，从河南空运到贵州与杨森合作，以对付日军的进攻。那晓得日本侵略军不几天就自动退往广西去了，贵州恢复了平静，这就给了在峨嵋山下的蒋介石以坐待抗日战争胜利的时间。

吴鼎昌只带三个人到贵州，杨森就不同了，他是带了一大批旧部浩浩荡荡开进贵阳。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民政厅当主任秘书，厅长孙希文被调回行政院，我留下替孙办移交，吴鼎昌下手令，将我调到省政府当秘书兼第三科（人事科）科长，对我说：“你是国家公务员，不必跟孙厅长走。”这以后四年，我又兼了好几个机要的职务，成为吴鼎昌的亲信幕僚。那时我也自认我是国家的公务员，不是某某长官的私人；我是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我的职位是受法律保障的。因此，杨森来了，我照样上班，坚持在几个机要岗位上不动。

杨森是旧军阀，“奉正朔”以后，也学到了一些新军阀的手法。他一打听，知道我在贵州已经七年了，有了一些苦劳，也有一些“声望”，要顾虑到舆情，不便一下子把我拿掉。可是，他带来的一批人马，已经住在旅馆里了。

他接任的第二天发表李寰为秘书长，葛覃为主任秘书，以补吴鼎昌带走的缺额。他约我到主席会客室谈话。他说：“我知道这些

年你很辛苦，地方人士对你很称道，希望你安心供职，跟吴主席在时一样和我共事。”我表示了谢意，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约我谈话。这回不是在会客室，而是在他办公桌的对面，让我坐下。他说：“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于永滋（注）处长去重庆当监察委员了，所遗处长一缺，行政院根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的提请，决定派一姓孟的来接替，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你最合适，你在这里辛苦了几年，应该升一升了。我已经复电行政院对来人挡驾，并保荐了你，行政院会尊重我的意见的，你就去合管处接事吧。”

这是一件出我意料的事。论官阶，处长比省政府科秘大（省政府科长秘书是荐任官，厅处长是简任官），确是对我的抬举；论工作，我现任的省府秘书兼人事科长，兼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委员、军政联合视察室主任，职掌机要，是能作一些事的。我已经意识到，这些机要职位，杨森必要安置他的私人，正准备向他辞职，没想到他来这一手，总算是他的好意，不能推辞。当即回答说：

“谢谢主席的栽培，请您派定接替我职务的人，办了交接手续以后，我就到合管处接事。”

离开主席办公室，我到隔壁的秘书长办公室，李寰马上站起

（注）于永滋，原名树德，河北省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北方与李大钊齐名，以后脱离了党，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任贵州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一九四五年以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解放后，在全国合作总社任领导职务，一九七八年任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八二年春在北京逝世。

来，向我满脸笑容地表示祝贺。他是跟杨森多年的幕僚，中等身材，四方脸，两只眯细眼，是非常油滑贪婪的官僚，以后一切卖官索贿的勾当，都由他发动指使，以他为枢纽的。我也只好报以一笑，并说：“感谢您的关照！”

不久，行政院批准了杨森的请求，发表我任贵州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我到合管处接了事。

杨森到任三个月，把吴鼎昌时期派任的专员、县长大部分都撤换了，分别安置了他的旧部，公开地索贿、卖官，把贵州闹得乌烟瘴气。

当时的遵义县长卜青芳，是吴鼎昌派任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遵义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邵陵，则是杨森新派来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在一个衙门里。这天，邵陵来到卜青芳的办公室。坐定以后，邵开口说：“我在内江订购了一批糖，还缺一笔款子，请你哥子帮个忙，暂先垫借一下，候糖到了，一定归垫。”卜青芳一九三八年到贵州，历任剑河县政府秘书，仁怀县长等职，调到遵义不满半年。遵义是贵州第一大县，是个肥缺，不用额外贪污，就凭国民政府“法”定的陋规，当县长的每年就有好几十万收入。邵陵很清楚，因此向卜青芳敲竹杠。卜青芳听了邵陵的话，心里也很清楚，分明是向他索贿，顶头上司开了口，怎么好拒绝呢？他满脸堆笑地说：“好好，专座要用多少？”邵陵举起五个手指，意思是五十万。卜青芳说：“叫出纳来问问，怕没有这么多现款吧！”出纳来了，很识相，向县长说：“银行存款还够。”

卜青芳后来告诉我，就这一下子折合黄金约十条。半年以后，省政府另派县长来接替了卜青芳。十条黄金仅仅延长县长寿命半年。

杨森的部下，都是抱着这个思想——跟杨森多年了，这回到贵州，是上面有意思调剂，还不乘这个机会捞一把，解决下半辈子的生活问题？贵州本是“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老百姓已够苦的了，又遭到这一批虎狼的吞噬，人民怎么能忍受下去呢？

蒋介石的统治，在接近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已经腐败到溃灭的边缘。

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非常苦闷。可是不久“八·一五”日本投降，蒋介石主席等待的胜利终于来了，我决心离开贵州，以到重庆“述职”为名，看看有什么别的机会。得到杨森的批准，八月十九日从贵阳坐飞机到了重庆。

我是怎样到东北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到重庆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二月，我以贵州省民政厅秘书，被调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六期受训一个月。第二次是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七月，我以贵州省政府秘书被调到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第二期受训六个月。

第一次受训回来，民政厅长孙希文问我：“你的感想如何？”我说：“这次总算认识了许多党国要人，原来都是稀松平常，没有一个能令我衷心钦佩的，确实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孙希文说：“我也是这么看的。”他曾于一九三九年参加过党政训练班第一期受训。

第二次受训的高级班，被称为类似宋朝朱熹办的白鹿书院，为培养国民党高级干部而设。六个月的实际生活，我感受到的只是一套官样形式，实质的思想认识，没有任何提高，但这次受训结业算

是给了我当简任官的资格。(注)

两次去抗战的陪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好的印象，气候闷热得使人出不来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虚伪庸俗的应酬——吃酒席打麻将，跳交际舞。舆论谴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点也不过分。我这个从山窝窝贵阳来的人，感到不习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我第三次到重庆，这是“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四天。

这次到重庆使我走上了国内战争罪犯的道路。

到重庆的当天下午，我住进了上清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床上铺的篾席子，日夜都是滚烫的，坐在房间里不动，都汗出不止。这时，重庆上层政治圈子里的人们都在忙着如何抢先到沦陷区去当接收大员。碰到一些熟朋友，谈话的主题不外上哪儿去，去台湾？天津？上海？东北？人们认为：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这些沦陷地区，理所当然地应由政府派员接收。

到重庆后的第二天，我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看望了郑道儒先生。

郑道儒，字达如，天津人，南开大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回国后

(注) 按国民政府的官等官俸制度，将文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特任不分级，中央各部部长为特任官，月俸八百元；简任分八级，中央各部(会)次长、司局长，省主席、市长等为简任官，月俸四百三十元到六百八十元；荐任官分十二级，中央各部会，省、市厅处的科长、秘书，视察督学及县长，省辖市长等为荐任官，月俸由一百八十元到四百元；委任官分十六级，各省、市政府及中央机关的科员、股长及县政府的秘书、科长等是委任官，月俸从六十元到二百元。

曾任绥远省教育厅长，当时绥远省政府主席是傅作义先生。一九三六年调到行政院任简任秘书。一九三五年我参加国民政府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被分发到行政院工作，从那时起，我与郑先生开始认识、共事。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他调到大本营第四部工作，部长是吴鼎昌先生。一九三七年底郑随吴到贵州任省政府秘书长七年。经过这七年的共事，彼此就很熟悉了。一九四五年初郑先生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蒋廷黻先生。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蒋廷黻先生是文学院历史系主任。我任学生会主席，蒋当教授会主席。一九三一年春爆发的驱逐校长吴南轩的风潮，学生会与教授会通力合作。因此，吴南轩虽然有蒋介石、陈立夫的支持，终于不能不捏着鼻子回到南京，风潮以学生、教授方面的全胜而告终。因此，我与廷黻先生除了师生关系外，还有一种共同战斗的情谊。但从交往中，我感到蒋先生为人跋扈，相当霸道，心里不佩服。一九三五年，蒋先生跟胡适、任鸿隽等办《独立评论》，鼓吹“好人政府”。一九三六年汪精卫被刺，蒋介石兼行政院长，组织所谓名流内阁，蒋廷黻先生遂抛弃教授生涯，正式参加了蒋介石的政府，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一九四五年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这个衙门是为了分配美国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名义拨给中国的一些面粉、旧衣服等救济物资而设的。蒋廷黻先生用了一批清华学生做他的助手；郑道儒先生是副署长之一，也请了一些原在贵州工作的旧同事帮忙。

跟郑道儒的会唔和谈话很重要。因为这次谈话决定我去东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地点是郑的办公室。

郑问我：“大半年来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走后杨子惠（杨森

字子惠)在贵州搞得怎么样?”

我把杨森调我当合管处长的经过,扼要地谈了。接着说:“中国的政治离上轨道还远着呢,吴先生(指吴鼎昌)和您在贵州辛辛苦苦搞了七年,总算搞出个轨道来,可杨子惠一到,一夜之间把你们打的一点基础完全推翻了,现在贵州是贿赂公行,乌烟瘴气啊,杨先生本人凭兴趣办事,毫无章法,他带来大批旧部,抱着一个到贵州来解决下半辈子生活问题的思想,您说老百姓还不够受么,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唉!”郑连声慨叹。

“吴先生在贵阳七年,准时上下班,做事有板有眼,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现在杨子惠的政治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乱弹琴,譬如不久前,他召开了全省行政会议,把他新换的专员、县长都招呼到省里来了,既没准备一个纲领,也没个目的,开会的第三天,他叫大家跟他去清镇参观种马场,看马怎样人工授精;会议结束时,他开了一个家庭娱乐晚会招待大家,由他的几十名子女上台表演,倒是逗得大家乐哈哈地。可是,究竟怎样治理贵州,以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需要,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谈。”

郑:“杨子惠手里有枪杆子,一直是拥护蒋先生的,在去年独山吃紧的情况下调他接替达公(吴鼎昌字达铨)是必要的;但我看他在贵州不会呆多久。”

“不谈这个,你现在来得正好,中央正在考虑接收东北,大致已经决定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二市,这几天正安排去东北的人事。”

“怎么安排?”我问。

“准备设东北行营,接收东北的最高负责人选陈辞修(阵诚)、

张岳军（张群）、吴铁城、张文伯（张治中）、熊天翼（熊式辉）等人都想到东北一试身手；最近已决定叫熊天翼去。由达公的推荐，内定我去吉林组织省政府，我想请你担任民政厅长。东北沦陷十四年老百姓很盼望中央早点去接收，那是块大有作为的地方。不过，东北历来是日俄角逐之区，现在日本被打垮了，苏联又乘机占领了，中共的势力也颇有根基，能否顺利接收过来，还不能肯定，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您如决定去，我当然应该帮忙。贵州环境太恶劣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呆下去。这次来重庆，我本想请吴达公安置在文官处，在他身边做点工作，或者派回浙江，在家乡做点工作。”

“你见过达公公么？”

“我还没见他，先来见您，了解重庆主要政治情况，再去看他。”

“组织去吉林的班底，准备请骥伯（吴至恭字骥伯，即吴鼎昌一九三七年底到贵州时随带的三人中的一个，在贵州七年一直任省府机要秘书兼绥靖公署经理处长）和你两人跟我去，已跟吴先生谈过，他完全同意。你去见见他吧！”

第二天，我去国民政府见到文官长吴鼎昌。

他告诉我：已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重划东北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哈尔滨、大连两个行政院直辖市。

他说：“已内定郑达如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原本拟定划长春为直辖市，因为它是伪满国都，我向蒋主席建议，才改为吉林省辖市。”他颇为自得地，用着重语气说：“这样，我就替郑达如争得一个重要地方。”接着他说：“达如已和我商量过，要吴至恭与你

同去吉林，我赞成。昨天，合江省主席吴瀚涛来见我，请我介绍一个人当省政府秘书长，我也推荐了你，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我本想在您跟前帮你做点事，可以多学一些见识。”

吴说：“东北地方重要，先去地方历练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央来，岂不更好？”

话题转到国共谈判。吴鼎昌先生颇为得意地说：“现在毛润之先生亲自来重庆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谈判，是我向蒋主席建议连发三次电报才请来的，电报是我亲笔拟的。”

我说：“您可真替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衷心地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对外打了八年十分艰苦的仗，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只要国共两党开诚合作，和平建设，国家前途大有希望。再说，共产党已经羽毛丰满，决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所以千万不能对共产党用兵，这一点希望您要坚持。”

他说：“两党之间的问题很多，很复杂，虽然在谈，不能轻易乐观。现在共产党力量壮大了，而且还牵涉到苏联，特别在东北，现在日本的势力垮了，俄国的势力又进来了，比日本更难对付，你们去东北就会知道，那里是很不容易应付的。”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在重庆上层政治圈子里的“接收”热潮，特别是接收东北热潮比当地的气温要高得多。国民党内的各派系都看中东北这块肥肉。对于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人选的角逐争夺十分剧烈。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接收东北九省办法》规定重划东北为九省和两个行政院直辖市。关于接收东北的组

织，规定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为东北最高军政机关，行营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分别主持政治、经济；下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指挥军事，维持治安。各省、市政府的组织暂不确定，把伪满洲国地方机关接收过来以后，再酌按关内编制调整。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自兼。委员有莫德惠、朱云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张作相、王树翰、达王等。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政学系领导人之一张嘉璈（字公权）担任。委员有王家桢、马毅、张振鹭等人。东北行营参谋长经蒋介石先生同意，调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担任。发表后不久，在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的宴会上，何将军饮酒过度，引起眼疾，终致失明。参谋长职务由另一东北军将领董英斌接任。同时，发表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潘公弼为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

十月八日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那时，云南省主席龙云被逼下台，由何应钦、宋子文陪同到重庆。龙云恨透了杜聿明，逢人便骂，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蒋介石先生施用了权诈手段，于十六日发表命令，将杜聿明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十月十八日却又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人选，由于各派系角逐，迟至九月五日才发表任命令。蒋介石曾说过：“要在东北籍的立法、监察委员中遴选。”因此，其中有好几位是东北籍的立法、监察委员。各方面争夺的结果是：

- 1、辽宁省主席徐箴。他曾做过蒋介石家乡浙江奉化区专员，和CC系的领导人陈果夫接近，以后又和张群有关系。
- 2、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刘是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
- 3、安东省主席高惜冰。高曾在新疆依附盛世才，和CC系